

邓小平的语言魅力

□ 史全伟

英国前首相希思曾这样评价邓小平：“我很享受和邓小平的交谈，而且发现他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既坦率又直接。我讲什么，他看起来也总是乐于接受。对直截了当的提问，他答得也直截了当。他还喜欢用幽默给我们的谈话增加点佐料。”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，邓小平的胸怀和气质都是十分博大的，但这并不妨碍他朴实、幽默的语言风格。他常用朴实生动、诙谐风趣的语言来阐述深刻的道理，用平易近人的话语使人感到亲切自然，也使得气氛轻松愉快。

在阐释一些重大的问题时，邓小平善于用浅显明了、生动形象的词汇使其鲜活通俗，往往只几个字就表达出其深刻的思想，且让人容易理解，难以忘怀。

提起通俗，举世皆知的是他的“猫论”。1962年7月，邓小平在谈到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时，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他引用了一句四川的俗语：“黄猫、黑猫，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。”这是“猫论”第一次公之于众。



后来慢慢传为“不管黑猫白猫，捉到老鼠就是好猫”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“猫论”成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。1985年，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年度风云人物，“不管黑猫白猫，捉到老鼠就是好猫”被摘登在《时代》周刊上。“猫论”的影响扩大到世界。

由于种种历史原因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“臃肿”问题由来已久。1985年6月4日，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宣布：“中国政府决定，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！”对于裁军，有人担心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。对此，邓小平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：“虚胖子能打仗？”他还进一步说：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，但是不虚，虚就不能进行拳击。我讲过，我们的肿，真正打起仗来，就是跑反也跑不赢。

在严肃紧张或出现差错的时候，邓小平的风趣和幽默，往往能起到活跃气氛、松弛神经的良好效果。

1960年，邓小平率团参加莫斯科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。

有一天，在激烈的争论之后，中共代表团成员回到大使馆的饭厅吃饭。吃饭时，大家都不说话，气氛很凝重。这时，邓小平忽然招呼刘晓大使的夫人张毅，笑着问：“张毅啊，你是江西人，你知道‘兔子吃鸡’这个掌故吗？”

“什么，兔子吃鸡？”张毅以为听错了。

“对，兔子吃鸡。”

“哎呀，小平同志，我只听说过黄鼠狼吃鸡，可从来没听说过兔子会吃鸡。”张毅欲忍住笑却又忍不住，鼓着嘴巴摇头，“而且还有什么掌故？”

“当然有掌故，此事发生在30年代。”邓小平含笑望望大家。大家也都望着他，急切地等着听下文。

“这事出在陆定一身上。”

“是在延安吗？”有人问。

“是在延安，但不是延安的兔子。”

是有一次在延安作报告，谈到托洛茨基什么的，他那个无锡话就糟了。说来说去总是‘兔子吃鸡’。我们有些同志听完报告，总是不相信‘兔子吃鸡’，就像张毅现在一样，边出会场边打听：‘兔子吃鸡’怎么回事？没听说兔子还会吃鸡呀……”

大家恍然大悟，饭厅里顿时笑成一片。刚才凝重的气氛被这一片开心的笑声一扫而光，大家的胃口也好了起来。

1988年1月，邓小平以84岁的高龄接见了48岁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。给邓小平担任翻译的是后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，当时她还很年轻，是第一次担任高级领导人的会谈翻译，不免有些紧张。邓小平向挪威首相说，他今年已经84岁了。但是傅莹一不留神，将84岁译成了48岁。当副外长周南把这一情形告诉邓小平时，邓小平不但没有批评傅莹，反而开怀大笑，幽默地说：“好呀，我有返老还童术，竟然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喽。”布伦特兰夫人也笑得合不拢嘴，谈话的气氛变得轻松、和谐。

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，邓小平的风趣幽默，也起着沟通情感的作用，使人在与他相处时倍感亲切、轻松和愉快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邓小平调北京工作。子女问他：在重庆大家叫你首长，到北京叫什么？邓小平用谐音回答：“在重庆叫首长（手掌），到北京叫脚掌。”从邓小平幽默风趣的话语中，子女们感到了父亲的可爱和亲近。

1984年，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科尔一行。当科尔问邓小平有什么长寿的秘诀时，邓小平作答：“我就是乐观，天塌下来也不要紧。我是小个子，天塌下来有你们大个子顶着。”邓小平的话引起了全场的一片欢笑。在惬意的笑声中，大家向这位睿智、风趣的老政治家投去敬重的目光。

（摘自2019年第6期《湘潮》）

刘瑞龙：生死寻常事

□ 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

刘瑞龙，江苏南通人，生于1910年，1988年逝世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江苏省委外县工委书记，江苏农委书记，红十九军政治部主任，川陕省委宣传部长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。

1936年冬至1937年4月，为了打通与苏联“国际通道”的战略任务，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，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体的21800名西路军指战员，西渡黄河作战。进入甘肃河西地区，西路军遭遇国民党马步芳、马步青集团的围追堵截，历经浴血奋战，终因敌众我寡，力量悬殊，加之气候寒冷、环境险恶、无群众基础和后续支持等原因兵败河西。1937年春，刘瑞龙跟随毕占云支队在山里同

敌人周旋两个月后，被当地藏族民团搜山时发现，送交敌韩起功集中营，转押张掖看守所，同押的有魏传统、惠子明、徐宏才、袁正明、董光益、张玉清、刘金生等。他们经过相互了解，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，刘瑞龙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，党支部以“坚定思想，稳定内部”为任务，相约绝不暴露原来姓名和身份。他们每天利用放风时间，在地上划“坚定”二字互勉，边划边抹，并互唱《苏武牧羊》，以此相互鼓励。当年八九月份，他们8人被马家军押送西宁。临行前，刘瑞龙等8人表现十分镇定，并请前来送行的同志们转告党组织：“生死寻常事，万一不幸，请告诉家里人，不要难过。”

刘瑞龙等人到西宁后，敌人对他们进行单独审讯。但刘瑞龙

李忠贵生于1956年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人，中共党员，壮族。1972年从富宁县卫生培训班毕业后，李忠贵到郎恒乡卫生所当医生。1977年，李忠贵应征入伍，在部队里发挥所长担任卫生员。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被任命为排长并被选送到大连陆军学校深造。在军校，他刻苦学习，因成绩优异两次受到嘉奖。毕业后，被分配到黑龙江边防六团的他一待就是7年。

1987年12月，李忠贵转业回到富宁县，成为县城区派出所一名民警，强烈的责任感使李忠贵总是尽最大努力去遏制违法犯罪。1991年6月12日晚，有4个歹徒在城区新华镇一家旅社实施抢劫后逃跑。派出所接到报案后迅速出击，抓获了其中一人赵某某，他供出了其他人的姓名和住址后，富宁县公安局抽调民警分3组实施抓捕。13日凌晨1时，李

忠贵和战友们押着赵某某前往歹徒“老飞”的住地。敲开其家门后，民警们借着昏暗的手电筒光发现此人是一名连续3次被判有期徒刑的抢劫惯犯。因“老飞”家中还有其哥嫂和孩子们，为避免伤亡及无辜，民警决定设法将其引出家中。“老飞”被诱出门外后，民警打开手电筒直射在其面部，一名民警上前搜身时，“老飞”突然把举着的双手放下并迅速伸进裤子口袋。这名民警察觉不对并大喊“他有手榴弹，按住他！”电光石火间，李忠贵闪电般扑向歹徒，紧紧按住歹徒的手并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身后战友。一声巨响后，李忠贵壮烈牺牲。

1991年10月，李忠贵被公安部追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，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。

（摘自2019年10月16日《北京日报》，原标题为《一级英模李忠贵：舍身扑向引爆手榴弹的罪犯》）



一级英模李忠贵：舍生取义谱壮歌

□ 王研

亲历上甘岭战役

□ 张计发/口述 叶松/整理

张计发，1926年12月生，河北省赞皇县人。1945年6月参军，194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参加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，荣立特等功4次、一等功2次。

1952年，朝鲜战场呈现胶着态势。这一年秋，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向我军发起了“金化攻势”，作战双方在约3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陆续投入作战兵力共10万余人，这场战斗发展成战役规模。10月14日凌晨3点半，上甘岭战役拉开序幕。当时，我因为负伤在师部医院住了七八天，回到部队后，我所在的七连已经参加战斗，所以我没能赶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战斗。我在团部待了没几天，七连就撤下来休整了，参谋长命令我继续带好这支队伍。

夺回597.9高地表面阵地

10月30日，上级下达朝鲜战场中线决定性反击命令，七连的任务是参加上甘岭战役第三阶段的战斗，夺回五圣山东麓咽喉的上甘岭597.9高地表面阵地。受领任务后，全连整装待发，直奔上甘岭。

进攻时间定在当天夜晚10点，战斗的目标是把阵地夺回来，全面恢复我军对597.9高地的表面控制权。战斗顺序是炮兵先打三个急袭：第一个急袭10分钟，主要是对目标阵地破坏性的摧毁，然后停10分钟。第二个急袭还是10分钟，停5分钟；四连在最前沿的坑道内，距敌最近，这时在炮火停止后组织几个人出来，连冲带喊带打枪，给敌人造成我们发起冲锋的假象，诱敌展开进攻，佯攻的时间不超过1分钟，立即撤回。第三个急袭就是铺天盖地打过去，还是10分钟，目的是消灭跑到阵地上的敌人。三个急袭后，表面阵地上的敌人和工事基本上摧毁70%以上。

炮火之后，随即发起冲击。上级要求第一批冲击的连队要跟着炮弹上，宁可让掉队的炮弹打倒我们一两个自己人，也不准敌人从坑道里出来，不给他们还击的时机。

按计划，四连第一批冲击，跟着炮火上，把敌人堵在工事里，在工事里将其消灭，阵地就会很顺利地夺回来。如果四连拿不下阵地，则六连强攻把阵地拿下。如果六连没有力量坚守，这时七连顶上去，目标很明确，无论如何也要占领阵地。

可是四连指导员沉不住气，提前1分钟下令冲锋。就这短短60秒的时间，三四十个人被打得失了战斗力，十几个人倒下了，剩下的20来人根本没法继续进攻。四连没有按预期将敌人堵在工事里。敌人冲了出来，这给我们下一步的进攻带来很大困难。

六连只好提前发起冲锋。受敌人火力压制，伤亡很大，六连长万福来也受了重伤，六连没有拿下阵地。

此时，敌人已经得到充分的喘息，情况更加严峻。我方没有炮火支援，只能靠手中的武器冲击，而此时敌人火力已全面展开，压得我方无法还击。

紧急关头，负责指挥的二营参谋长张广生派人把我叫到4号坑道。我刚进坑道就看见万连长躺在那里，满脸是血，但意识清醒。见我进来，他指指里面，大概是想告诉我参谋长在里面等我。参谋长见到我就说：“六连伤亡很大也没上得去，你们连赶快上，不惜一切代价把阵地拿下！”

我接受命令后急忙向外走去，带上七连战士往上冲，敌人后续部队也在往上冲，狭路相逢，拼的不仅是武器，还有胆气。

突击排的战士端着冲锋枪，冒着枪林弹雨硬是冲了上去，一梭子子弹

打完了，接着就是一排排的手榴弹投了出去，然后又是一梭子子弹、一排排手榴弹。敌人被我们的气势吓退了，我们终于占住了山头。

但没过多久，敌人趁我们立足未稳，立即组织力量反扑。只见黑压压一片锒亮的钢盔，臭虫般密麻麻地向阵地扑来，我们拼全力反击。

我连突击排连续冲了三次才把整个阵地占领。随即三个排都上到了阵地，火力得以全部展开，冲着四面一齐开火，彻底把敌人给压了下去，稳固了阵地。

至此，我们一举恢复了1号、3号、9号阵地，恢复了597.9高地上主要阵地的控制权。

为荣誉而战，坚守24小时

我们占领597.9高地表面阵地后，敌人开始了疯狂报复，每日落弹十几万发，表面阵地2米多厚的岩石被打成了粉末，所有的工事自然也荡然无存。

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，要守住阵地真是非常艰难。为了保存实力，我命令大部分人员撤进坑道，阵地上只留一小部分人观察，只要发现敌人开始进攻，部队立即运动到作战位置进行回击。

为了激励战斗情绪，党支部提出“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！为祖国争光！为祖国人民立功！轻伤不下火线，重伤不累好人，一人为整体负责！”等一小部分人观察，只要发现敌人开始进攻，部队立即运动到作战位置进行回击。

在这危急关头，我突然眼前一亮，想起了管炮兵的副师长唐万成。我马上命令步话机员接通电话：“副师长！副师长！王八上来了，我们还剩二十几条了！”“王八”是指敌人，我们二十几条”是隐语（意思是我们还有二十几个人可以战斗）。因为步话机是明码通话，敌人也能听到，不能暴露我们的实力。

“有多少王八？”副师长问。

“300多，就快要爬到我们9号阵地上来了！请求炮火从9号阵地100米处开始往下压。”

炮弹呼啸着飞上阵地，一阵电闪雷鸣，200多个敌人炸死在了阵地上，一只“王八”也没爬上来，我们

育大家为荣誉而战。

31日下午4点钟，七连加上三连后续补上来的战士，有战斗力的不到30人。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，敌军300多人向我们扑来。我万分焦急，赶紧向团长请求支援，可是团里各部队都在阵地上，团长急得团团转。

按照师部原先的战斗部署，我们一三五团攻下阵地后，八十七团应在31日晚上接替我们。可现在天还没黑，我们的人就快打光了。团长赶忙给八十七团团长打电话，请求他们提前上阵，但八十七团团长坚持要按照师里的部署行动，因为白天炮火重，上到阵地损失大。

敌人显然是不愿夜战，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在天黑之前速战速决，一举夺回阵地。他们几百人一起往上冲锋，黑压压的一片，源源不断地向阵地拥来。

在这危急关头，我突然眼前一亮，想起了管炮兵的副师长唐万成。我马上命令步话机员接通电话：“副师长！副师长！王八上来了，我们还剩二十几条了！”“王八”是指敌人，我们二十几条”是隐语（意思是我们还有二十几个人可以战斗）。因为步话机是明码通话，敌人也能听到，不能暴露我们的实力。

“有多少王八？”副师长问。

“300多，就快要爬到我们9号阵地上来了！请求炮火从9号阵地100米处开始往下压。”

炮弹呼啸着飞上阵地，一阵电闪雷鸣，200多个敌人炸死在了阵地上，一只“王八”也没爬上来，我们

高兴地欢呼起来。在炮兵兄弟的支援下，我们坚持到了傍晚。

三天三夜的坚守

当天夜晚8时许，八十七团一位副排长带领一个班赶过来了。这个班的兵力对我们来说，可真是雪中送炭。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，我清点人数后发现，除了我们七连8人之外，八十七团上来的人也寥寥无几。

算算时间，后续的部队应该就快到了，我们应该可以坚持到那个点。于是，我对八十七团副排长说：“谢谢你们的支援，现在敌人的进攻少了，你们赶快回去向你们团长报告这儿的情况吧！”

刚送走八十七团的同志，我们团的通信员就到阵地上来了，他带来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我们七连已经圆满完成战斗任务。通信员接着说：“团长命令，你们一个排留下一个人，你留下，再留一个通信员给后续部队当顾问，其他的都撤回去。”

我说：“你赶快报告，我们就剩下8个人了，我的意见是要么都不下去，留下来继续战斗；要么我一个人留下，他们7个都下去。”

过了半个钟头，通信员回来说：“首长同意张连长你的意见，你一个人留下，他们都回去。不过有一条，凡是上来的部队都归你指挥，但是丢了阵地也由你负责！”

11月1日1时，后续部队上到阵地。次日1时，十二军九十一团三营八连奉命上来守卫阵地。按照原先的部署，大部分人员撤进坑道，根据敌情变化灵活调动兵力，在有效保存自己的

同时，大量消耗敌人，我和九十一团同志又战斗了24小时。

至此，我在阵地上已经打了三天三夜，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。通信员私下将我的情况报告给了团长，团里派我们连副指导员来到阵地，换我下去休息。

我内心并不想下去，虽然三天没吃没喝，但是精神高度紧张，竟然一点也不累，感觉身上都是力气，还可以继续战斗。但是，上级命令我下去是对我的关心和爱护，也是对副指导员的信任，我不能再多讲。

当天夜里10点左右，我开始动身出发。临走前，我到小坑道里拿了5支崭新的卡宾枪。这是我们在战斗中缴获的，有一整箱，都没有用过。我心里盘算着，带回去给我们连3个通信员一人一支，再给营里两支。

说来也怪，正当我往回走的时候，突然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，居然挪不动了。于是，我一咬牙，狠下心，扔掉了一支枪，后来又扔掉了两支，只带回来两支。

从597.9高地上撤下来后，我先向营、团首长汇报战斗情况，然后回到连队。全连的同志一起来迎接我，见到他们我心里感到暖烘烘的，经历了一场生死与共的战斗后，我们的感情又一次得到升华。

后来，我们七连被授予集体一等功，我和指导员分别被授予一等功，军党委授予七连“攻的勇猛，守的顽强”光荣称号，授予我“军政双全的好连长”荣誉称号，并在全军通报表扬。

（摘自2019年第10期《百年潮》，原标题为《难忘的“上甘岭战役”》）

